

西域南海 史地考证译丛

第一卷
冯承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

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第一卷

(一一五編)

馮承鈞 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河北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ISBN7-100-01597-9/K·368

1962年11月重印第1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95年5月北京第2次影印

字數 388 千

印數 3,000 冊

印張 24

定價：29.60 圓



前言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是馮承鈞先生翻譯的短篇論文集。馮先生生前共發表了四編，本書是第一編，在一九三四年出版。前幾年整理先生舊作，爲了便於研究西域南海史地者參考使用，將他翻譯的一些遺稿和出版過的專書，以及散在舊雜誌上的短篇論文，彙輯一起，又繼續編了五編，即自一九五六年由中華書局連續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至九編。當時因工作疏漏，未向讀者交代，現在也借本書重版的機會一併說明。

馮先生這九編譯文集裏，主要是收集了近代法國資產階級「漢學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沙畹、烈維、伯希和、司馬帛洛等，有關研究西域南海方面的著作。共計七十九篇，大都是發表在通報 (*T'oung Pao*)、亞洲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及河內法國遠東學校校刊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上的。它們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民族、語言、歷史、地理、宗教、文化、藝術各方面；利用的資料除了我國的史籍文獻以外，還包括了不少其他國家的文獻資料和一些西方學者寫作的有關專書及論文。

二十世紀初期，是法國「漢學」極盛時代。這些資產階級「漢學家」利用比較豐富的語言學知識，研究我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歷史。當然，這種研究的目的，還是直接或間接的爲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服務的。在這些論文中，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對於古代中國與西域南海關係的歷史發展，和西域南海國家在世界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提出科學性的闡述，有時甚至還臆造出舛謬的結論。但是他們在亞洲各國的資料搜集整理方面，特別是在古代中國與西域南海文化交通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作了不少的工作。如果我們能夠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採取批判的態度，這九編譯文集裏，某些具體歷史事實的考訂，還是可供參考的。

馮先生翻譯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前四編出版，迄今已二十餘年。當時因印數不多，已不易購得。今天爲了滿足國內需要，又將它全部校訂重印，對於研究這一方面歷史的人，却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我們深信，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這門科學在我國的歷史科學中，一定是會呈現出新的光芒的！

最後將這九編譯文集的目錄附後，以供參考。

陸峻嶺 一九六二·十·於北京

目 錄

玄奘記傳中之千泉·····	(五)
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	(七)
梵衍那考補註·····	(一〇)
畏吾兒文殘卷中之地名·····	(一四)
突厥語與蒙古語中之驛站·····	(一七)
斡耳朵·····	(三)
元秘史舊蒙文中之一段訛誤·····	(二四)
評長春真人西遊記譯文·····	(二九)
澳門之起源·····	(三九)
評王國維遺書·····	(五)
評中國歷史商業地圖·····	(七二)

蒲陶……………(八三)

押不蘆……………(八四)

中亞史地叢考……………(一〇〇)

牟子考……………(一六〇)

右選考證之文十五篇，並出通報，其中十四篇皆屬伯希和教授近年撰作，惟「押不蘆」一篇乃勞費氏遺筆。兩年來命兒輩筆受，現既集而成帙，可續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諸編之後也。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馮承鈞識

玄奘記傳中之千泉

見一九三〇年刊通報一八九
至一九〇頁，伯希和撰

玄奘記傳曾說俄屬突厥斯坦 (Turkestan) 有突厥可汗避暑地，地名屏聿，此言「千泉」。自從 Vivien de Saint-Martin 以來，就從所謂蒙古語的 Ming-bulaq (其實是突厥語的寫法，而不是蒙古語的寫法) 一直推求到突厥幹思滿 (Osmanlı) 語的 Bing-göl，假定此名是屏聿的對音。我在一九三〇年刊通報 (一〇七頁) 註一中曾經說過 göl 就是 köl 的幹思滿語讀法，此二字皆訓湖或池，西突厥同嗚昆 (Orkhon) 河的北突厥固然皆謂「千」曰 bing，可是他們名湖曰 köl，而不用幹思滿語之 göl；但是遷就說，可從 Bing-göl 轉讀成 Bin'öl 的讀音，然不能從 Bing-köl 轉讀而成此音也。況且 köl 的意義始終訓湖或池，而不訓泉。

註一 或云：「蒙古語之 Ming boulaq' 突厥語作 Bing göl」。此種對於「千泉」之比附，不很正確；Ming bulaq 是純粹突厥語 (東突厥語)，蒙古語相對之稱實應作 Minghan

bulag, 至若 *bing göl* 乃是幹思滿語的寫法，與東突厥語之 *ming köi* 相對，此言「千湖」、「千池」，頗難與玄奘傳著錄的「千泉」土名屏聿音義相合。惟一確實之點，則在西突厥人謂千作 *bin*，同唄昆河突厥語的讀法一樣，可不是 *min* 的讀法，因為這是畏吾兒 (*Ouigour*) 人的讀法。

現在我以為應將 *Ming-köi* 或 *Bing-göl* 放棄。案 *koibal* 語有一 *yul* 字，訓為「山溪」，我先前因為他獨見而訓義不一定是「泉」，所以不敢引用。今檢 *Mahmūd kašghari* 書，自十一世紀始，數說 *yul* (& *yulag*) 字訓「泉」，(參看 *Brockhmann* 中世突厥字，一九二八年刊，九六頁)。此 *yul* 字恰與聿字的讀音相合，則應將屏聿還原作 *Bing-yul*。註一註二譯字用聿的很少；由此考訂或者可以尋究摩尼教經一箇未詳名稱「聿斯」的解說，關於此名者，可參看亞細亞報一九一三年刊一冊一六九頁；當時沙同我將此二字讀作 *yi-sseu*，現在既有 *Bing-yul* 之例，可以推想唐人的譯音讀聿作 *yu*。

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

見一九二九年刊通報一一〇
至一二二頁，伯希和撰

中國人早已賞識西亞工匠之技能；九世紀大食（Arabes）旅行家一方面也稱譽中國之藝術。中國藝術在蒙古時代流行於波斯以前，考古學業經證明此亞洲兩半部之交換，在九世紀同十世紀時頗爲活動；中國的陶器在當時美索波塔米亞（Mésopotamie）一帶已被人認識同仿造，而薩珊王朝（Sassanides）式樣的織物，已被人發現於敦煌。好像有一條八世紀中的記錄，尙未有人引證過。

七五一年高仙芝被大食人敗於恒羅斯（Talas）川；大食人相傳謂所擄之唐人乃將造纸工業輸入撒馬兒罕（Samarqand），復由此傳佈於一切回教國家。俘虜中有名杜環者，被擄至美索波塔米亞，終在七六二年回長安；歸途蓋自波斯灣附商舶而抵廣州。環歸後撰經行記，不幸其本已佚，可是其族人杜佑（七三五至八一二）業將其文節錄入七六六至八〇一年編纂的通典卷一九一至一九三等卷中。

這些節錄文中有一條尙長，記大食國事，說大食一名亞俱羅，此名顯然就是 Aquila 之對音，乃西利亞語名苦法 (Kufa) 之稱，即當時黑衣大食朝 (Abbasides) 第一次建都之地。註一杜環被擄後所抵之地，必是苦法無疑。此大食條中有一段文義頗不明，可是我祇能作如下的解釋，茲先引其文如下：註二

註一 沙晚在一九〇四年曾誤解此亞俱羅名稱 (通報一九〇四年刊七八頁)，可是確當的比附，業經 Hirth & Rockhill 在諸蕃志譯註本一一〇頁中著錄。不過在一〇四頁對於訛寫的杜還名稱未予注意而已；諸蕃志寫杜環之名作杜還，足證其未逕引通典，所本者應是通志 (卷一九六)，因為通志誤寫與諸蕃志同。

註二 此文由通典轉錄入太平寰宇記 (卷一八六)、通志 (卷一九六)、文獻通考 (卷三三九) 等編之中；通考亦誤作杜還，與通志同。

「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註三織絡者河東人樂隈註四、呂禮。」

註三 太平寰宇記作劉泚。

註四 太平寰宇記作樂還；通志作樂環。通考似引通志，(觀前文並作杜還可以知之)，然在

此處則作樂環，或者通志樂環之誤出於近代刻本，應取現藏日本之宋版通志校勘之；此環字不見於字書。

其意大概說紡織綾絹的機杼，製造金銀器物與繪畫等事，概由漢匠輸入，註五其言未免過甚，可是其文足資考證也。至若樊淑、劉泚、樂環、呂禮這些人名，或者不重見於他書，大概也是七五年敗後同杜環被俘至苦法的士卒。註六

註五 但是中國人輸入紡織機一事，或有可能。

註六 杜環經行記殘文業經王國維輯錄入其古行記校錄，並經羅振玉君收入王國維集中。可是王國維所據的，祇有通典同太平寰宇記的引文；而其所據的通典本似有不少訛誤。在他以前有一部經行記校注本，在一九一五年收入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中；據說這是丁謙蓬萊軒地理學叢書之一部份，全書在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間脫稿，然尚未刊行。此本偶而有用，惜頗少鑑別。丁謙在此段中將各本所有之「起」字刪去，而以作「字」屬下文。殊不知「起作」二字在漢時已見著錄也。

梵衍那考補註

見一九二九年刊通報一八三至一八七頁
伯希和評梵衍那之佛教古蹟文

七世紀時玄奘所記梵衍那(Bāmyān)國之兩大佛像，後在歐洲提起世人注意者，首有 Thomas Hyde 在一七〇〇年根據回教撰述之報告；繼有 Moorcroft & Trebeck 一八二四年之巡歷，接着有其他諸旅行家之尋訪，其中最勤奮者要數 Ch. Masson 君（一八三五）。其後認識沒有甚麼進步。一九二二年富涉(Foucher)君遊梵衍那，開闢阿富汗法國考古團之事業，然作第一次詳細研究，則讓 Godard 君夫婦（一九二二年）與 Hackin 君（一九二四年）爲之。就中若 Godard 君夫婦所摹之壁畫，可以說是一種啓示；佛教的神道同施主在其中表現的，皆是薩珊王朝(Sassanides)國王貴人之容貌衣冠。

我在此書七四至八三頁曾將中國載籍中關於梵衍那之記錄夏譯，尤注重於玄奘同慧超的記錄，可是漢字缺乏，未能將所考作透澈的說明。註一此外我尙有新考一兩條必須

發表，現在乘此機會表示於下。

註一 鈞案前考已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至十四頁，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條。

中國載籍對於 *Bāmiyān* 之最古譯名爲范陽，應在四九四年前採用，雖然是用中國地名移稱外國地方，要可證明中世波斯語的 *Bāmikan* 已在五世紀時變爲 *Bāmiyān*。我在引證其後諸譯名中，曾引有隋書卷八三之怛延，可是遺漏了同一時代裴矩西域圖記中之怛延，（隋書卷六七）。此外我引有隋書（卷四）六一五年下之失范延同舊唐書（卷四〇）之失苑延；這箇失范延不能說不是 *Pseudo-Moise de Khorene* 書著錄之 *Serei-Bāmikan*，同 *Istakhrī* 書著錄之 *Sir-i-Bāmiyān*（參看 *Marquart* 伊蘭考九二頁）。註二 由舊唐書之誤范作苑，令我推想到六五九至六六一年間所設西域府州中之范陽州，此州治所在拔特山城（*Badakhsān*）。世人已知道這些府州名稱幾盡是舊名新用，而其配置常爲武斷的，（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明白此理甚晚，所以他在此書二六八頁以後同索引中的說明尙未完備。）我以爲此范陽就是范陽之訛。

玄奘在西域記梵衍那條說「其王每於此設無遮大會」，我曾隨諸僚友後（尤其是烈維同沙畹之說），以爲「無遮」二字是梵文俗語 *Mokṣa* 之對音；後來我曾重新研究這

個問題，將來在別處另作詳細說明；暫應知者，無遮不是譯音，所謂無遮大會就是無礙大會，乃是梁武帝提倡的。玄奘借用此名以稱中亞同印度舉行的大會，這些大會原來五年一舉行，後來時常舉行，不限於五年了。

玄奘說梵衍那國「有宿麥，少花果」。我譯宿麥作冬麥，就是冬天以前種的而在春天出的小麥（或大麥）；檢西域記各本，此處無異文，至少可以說宋藏以來如此；如此看來，我們不能說宿麥二字不見他書，便疑其有誤了。但據富涉君說，梵衍那之氣候祇能容許在春季播種大小麥，又據玄奘西域記揭職註三條說，「少花果，多菽麥」，菽麥二字早見詩經，我曾想到梵衍那條之宿麥，或是菽麥之誤，宿菽二字音相近也。

註三 此國名尚未得其原名，揭職二字對音似是 *Karcik* 或 *Kacik*，與 *Gacik* 或 *Gas* 對音皆不合。

孰知問題愈趨複雜，玄奘西域記漕矩吒 (*Zabulistan*) 註四條亦用「宿麥」二字。

Julien (譯本二冊一八七頁) 又譯作「晚麥」；Beal (譯本一冊三〇頁) 在前一段中譯作「春麥」，註云「晚麥，春種」，而在此段中 (二冊二八三頁) 則作「冬麥」，別無註釋；Watters (譯本二冊二六四頁) 譯作「早麥」，與前段同。宿麥既然兩見，我於是尋求別見的古例，然無結果；本草綱目卷二二小麥條祇有秋種同春種之別，未見宿麥

二字。如此看來，這箇難題仍舊完全存在。De Groot(見慶祝 Sachau 紀念冊二六三頁)不識宿麥成語，以其意義不明，擬改「宿」爲「粟」，而又誤譯粟爲稻；這種改正正是武斷的，因爲粟麥二字不是一種流行成語，玄奘從未用過。到了十三世紀，常德奉使西行時，說擣思干(Samarkand)「麥亦秋種」。宿麥二字在西域記中既然兩見，我想保存此種寫法，並擬將揭職條之菽麥改作宿麥，可是富涉君說梵衍那地方僅在春季播種大小麥；難道說自七世紀以來，此地播種習慣業已變更麼？

註四 Watters 倡之於先，Sylvain Lévi 和之於後，皆以漕矩吒是梵文 jāguda 之對音；按 jāguda 是梵文番紅花之稱，而 Zabulistan 乃出產番紅花較多之地。可是我以為玄奘的譯名不是直接本於 jāguda 的。漕矩吒假擬對音是 Zawkuṭa 或 Dzawkuṭa，而非 jāguda。七百年頃此地的新譯名作謝颺，顯然是本於 Zawul = Zabul 的，而漕矩吒的 z 或 dz 發聲，並證明其發聲不是 j。按此晚見的 jāguda 名稱，好像是假之於一種具有 z 發聲的民族者，願梵文無 z，乃代以 j，而梵文之番紅花遂成地名。至若玄奘譯名中之 k 同 t 兩箇清聲聲母，頗難解說。關於此類名稱種種寫法，可並參考慶祝 Sachau 紀念冊，二八一至二八二頁 Marquart 氏之文。

畏吾兒文殘卷中之地名

見一九三一年刊通報四九三至四九五頁伯希和和許文

羽田亨君所撰大月氏與貴霜一文（史學雜誌第四十卷一〇二五至一〇五四頁），歷引舊考大月氏都城藍氏或監氏諸說。對於貴霜與 Kušan，則引繆萊（F. W. K. Müller）與柯努（Sten Konow）君之假說。詳究王樹枏君自新疆攜回之畏吾兒文摩尼教殘卷兩篇，其中著錄有四人，一人是 Qamlligh，一人是 Küsanlig，二人是 Sulmlligh 或 Solmlligh（此二文件好像是同一文件之殘文，所列舉者皆是名號職銜）。Qamlligh 當然是 Qamili 人，即今之庫木爾（Qomul），而漢名哈密者是也。繆萊曾刊布畏吾兒文題識，其中涉有 Tört Käsän（上一字猶言四）之國，旋謂 üč sulmida，猶言「三 Sulmi 中」。不幸後文殘缺，繆萊曾推測此 Solmi 或 Solnü 是否可以比附昔之折摩馱那（Calmadana），今之車爾成（Čarčen）（見吐火羅語與貴霜五八一至五八三頁）。羽田君當然將此原籍 Sulmi 或 Solmi 之人與此 三 Sulmi 比附對照。此外他並引證元史卷一二四哈剌赤哈赤北魯（上